

●《北京青年报》记者丛书之三●

骚动的剧场

——杨菊芳社会大特写集

●疯狂的迪斯科

●走穴轶闻录

●名烟的震荡



●中国城市出版社●

总 序

1991年7月3日，《北京青年报》迎来复刊10周年纪念日。

有人说，这张报纸成熟了。其实，是一批青年报人的成熟。

曾是怎样的条件：木板房，简易屋，地下室。于是，获得“地下工作者”的美称。

但走出来的，十八般武艺在身，一人能唱一台戏。

凭的是艰苦创业，超常发挥。一个人当三个人使，三个人跑九条战线。

凭的是集思广益，各显神通。谁都可以“指点江山”，谁的主意好，就照谁的办，谁就唱主角。

充满活力的集体，创造了充满活力的报纸，更造就了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报人。

愿这套丛书记录下他们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所做的贡献。

青出于蓝胜于蓝。这套丛书将不间断地下去。

《北京青年报》 社长 崔恩卿
总编 陈冀

“在自己深深热爱的新闻 道路上走下去”(序)

——记《北京青年报》记者杨菊芳

张维国

有些人因为《北京青年报》而熟悉了杨菊芳，有些人却由于杨菊芳而了解了《北京青年报》。她那一篇篇文笔优美隽永、可读性强的“社会大特写”，在读者中、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也使得这张地方团报颇有名气。无怪乎一些报界同行称：《北京青年报》有只很硬的“拳头”，那便是“社会大特写”。而“社会大特写”与杨菊芳又有着一种“契合”的“情缘”，使她的才华得以施展，特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总结经验时，她说：“是《北京青年报》让我找到了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位置。”然而，找到这一位置之前，她经历了艰难的跋涉，痛苦的摸索，走过了一段坎坷的人生旅程……

象所有生长在新中国的孩子一样，她有一个幸福而温馨的童年——踏着晶莹的晨露走向校园，擎着遐思去追赶夜空的流星，鸟儿衔走她美妙的憧憬，风儿带去她绮丽的梦幻……“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巨澜，卷走了她用春心编织起来的五彩缤纷的生活画卷。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惊愕、颤栗、

茫然不知所措，身心受到了严重伤害。这个人大附中六七届的初中毕业生，因家庭出身问题，竟整整在家待业八年。八年中，她在北京某糖果厂干过很长时间的临时工，靠出卖苦力来聊补十分拮据的家庭经济。1975年，她被分配到远离城区的金山酒厂，当了一名酒库工。一个女孩子，每天要挑几十斤重的水桶往返于崎岖的山路，比起在糖果厂干活那会儿，不知要苦上多少倍，可心却是甜的。一个“臭老九”的子女，能够不去“插队”，还谋到了这样一份差事，她已心满意足，对党和政府的关怀，更是感恩戴德。“这期间，我遇到几位好人，是他们影响了我整个人生。”每每讲这话的时候，她的眼里都充溢着一股不可遏制的激情。

这家酒厂座落在西山鹫峰脚下，周围是一片偌大的果园，环境幽雅，景色宜人。置身在大自然的怀抱，她心旷神怡，放性纵情，同时也激发了这个小学、中学时代就酷爱作文的女孩子的创作欲望。她不大善于辞令，笔要比嘴巴更能传达她内心的情感。她把第一篇融汇她全部思想感情的小说《玉兰祭》投到《北京文学》，很快，收到了编辑的复信，说她有文学才华，小说写得很有情味，编辑部已决定留用，并约她去面谈。她的心因激动而狂跳，一个人跑到山上大大地发了一阵“疯”，又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不幸的是，那绚烂的光环只在她眼前一闪，便消逝了。由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小说被退了回来，编辑在信上表示了歉意和惋惜之情，建议她投给别的文学杂志。当时，退稿放在厂传达室，一些目光短浅的人见到后，对她挖苦讽刺——“一个小工人还想当作家，真不知自个儿吃的几碗干饭。哼！”她的自尊心被重重地戳了一刀，不由得发了狠誓：“我一定要当上作家，干出成绩给你们看看！”她把小说寄给南京的《青春》，

虽未能发表，但依旧从编辑的评价上窥视到了自己的价值，建立起写作的信心。几年后，她饱蘸激情，旱这段经历写成了散文《编辑》，发表在兰州的《金城》杂志上。

《北京日报》的一位编辑，是她遇到的第二个好人，不仅给了她很多帮助和鼓励，而且还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散文《鹞峰雪》，文笔的圆熟、老道，竟使得很多读者误认为作者是个造诣高深的“学究”。她用有生以来挣得的第一笔稿费，买了一盆文竹，以象征她的文学事业。她要好好地养活这盆花，甚至迷信地想：只要花长得旺盛，她的文学事业就兴旺；如果花死了，她的文学生命也就完结了。怎奈，文竹偏偏就死了，而写作却并未因此而终止。这一年，她在北京日报上连续发表了三篇颇有影响的散文佳作。从此信心倍增，她想要寻得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一个偶然的机遇突然来到她身边，在一位同志的推荐下，她被借调到《中国机械报》。这个岗位，为她后来正式从事记者职业鸣响了前奏。

二

一到机械报，她就“练”了两篇大活儿，其中那篇文学味很浓的大特写《攀峰摘花者的歌》见报后，受到了读者和报社同仁的一致赞赏。她象是忽然悟出：自己原本不是擅长于搞纯文学的，而搞起新闻报道来却似乎颇有点“天赋”。她作起文章来很慢，精雕细镂，象是在完成一件艺术品，如果去写一般性的“消息”，似乎也有点“高射炮打蚊子”的味道。所以，若将散文式的优美文笔用于大特写和大通讯的写作，则能充分发挥其特长，得心应手，大有建树。

《中国机械报》领导虽对她十分赏识，却因她是集体企业的工人，而不能调入。凑巧海淀区广播站正在物色一名撰稿

人，表示只要她肯“屈尊大驾”，可以转成“全民干部”。就这样，她离开工作了三个月的中国机械报，到“海广”任职，时间是1984年的9月。

1986年年初，她把采写的两篇通讯寄给了《北京青年报》总编室主任。一篇是《当家庭教师的大学生》，一篇是写山村孩子的《这也是生活》。文章发表后，总编们高兴得了不得，找到总编室主任问：“这个作者是哪儿的？把她调咱们报社来得了。”可后来出于某种原因，这事却拖了下来。半年后，她为一篇稿子又到报社，恰巧碰到老总陈冀，俩人又深入谈了一次。这一次谈话，使陈冀下了调她进报社的决心。

上班的头一天，新闻部主任就把一篇自然来稿推到她面前，说：“这是写北京摩托车市的，题材很好，但写得不好，你是不是接下来？”她二话没说，跑到六里桥蹲了三天摩托车市，并练了一手漂亮活儿。虽然，她为自己那篇5000多字的原稿被编辑砍成2700字而大为不满，耿耿于怀，却无疑在众人面前展露了她的才气和文字功力。后来她被调到特稿组，再后来是记者部。她因此如鱼得水，一发而不可收，写出了一篇篇令人称道的“社会大特写”。

1991年1月15日，杨菊芳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上被授予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三

美国著名记者詹姆斯·拉斯顿说：“十九世纪是小说家的世纪，而二十世纪是新闻记者的世纪。”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写实”并有实可写的时代，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世界性“纪实文体热”方兴未艾。中国的记者们也不能不受

到这一历史大潮的裹挟。

她很喜欢写“正面报道”，尤其喜欢写那些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无私奉献孜孜奋斗的普通劳动者和改革者。但是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效应”的，却是她的反映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她展示了改革中的中国的色彩斑斓的面貌：既有合理又有不合理，既有美好又有丑恶，既有困惑又有希望。特别是将那些“黑底片”拿到太阳下显影曝光，对被冠以“现代意识”、堂而皇之地招摇惑众的腐朽思想观念，进行力透纸背的揭露和批判（这种揭露和批判，大多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往往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所以，写得较多，内容也很“杂”，从重大严肃的改革题材，到五花八门的都市文化，从三教九流，到突发事件，她的笔端涉及工厂、农村、部队，涉及高级消费场所、个体摊群和形形色色的“黑”市，被报社同志称誉为一部“全方位雷达”。可以说，每一篇“大特写”对她都是一个生疏的领域，但每篇“大特写”的采写过程都能使她熟悉一个领域、一个行业，并由此引发和深化她对商品经济的思考。

她在采访前一般都有明确的思路，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她的采访对象，知道该向他们提出哪些问题。也有时是拿到题目后，觉得可写，然后下去摸情况，在掌握材料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主题和文章的结构，通过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加以记述和描写，传达给读者。

她对采访对象一向以诚相待：对名人要员，不自轻自贱，妄自菲薄；对普通人甚至不入“正册”的倒儿爷，也不妄自尊大，端记者的架子。因此很能赢得采访对象的信赖，从而获得大量所需的素材。如写《名烟的震荡》时，她向前门一带的个体烟商了解名烟的进货渠道，以及用金钱编织起来

的层层关系网。最初，对方总是有意回避她的话题，或者在外围绕圈子不肯接触实质。这些人无一不是地道的“社会油子”，没点本事，休想从他们嘴里抠“肉”，更何况他们对记者有着一种本能的“提防”呢。然而，由于她的友好和真诚，并在保证自身利益不受到损害的前提下，一个谙熟“生意经”的烟商（即文中的“老K”），向她和盘托出了鲜为人知铜臭弥漫肮脏龌龊的进烟内幕，使她了解了烟倒儿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又如写《迷蒙的咖啡厅》前，她先是以真情感动了西单文园咖啡厅的小经理，当了这个年轻人的“表姐”，得以和老客们有较多较深的接触。她很能进入“角色”，跟“刺”和“蜜”的亲近、“套磁”中，她洞见了这些妖艳女子那华贵的服饰内所包裹的酸涩，高傲的外表里所隐藏的卑微，并且寄予了姊妹般的怜惜和同情。她们感念其诚，甚至误认为她和她们是一个道上的人，因而把自己的痛苦、遭遇、悲怨，全都一古脑儿地兜给了她。

前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王立行评价她的文章时说，作者所涉猎的内容，在“地摊文学”中比比皆是，但她不是用那些庸俗文学刺激读者的感官，写来并不“下作”。她在文学与新闻的狭缝中自成一体，如果也称之为报告文学的话，则既不同于作家，又有别于其他记者所写的这种体裁，比之前者，她的“文学性”差强人意；比之后者，“新闻性”又稍嫌薄弱，但你不能否认，她把文学与新闻结合得较为完美，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她的文章思辨性较强，善于把微观描写与宏观思考结合起来，揭示社会弊端和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加上她所涉及的题材往往是社会热点，因而具有很强的战斗性。不仅使高层领导了解到从纯新闻中难以了解到的情况，又以其强烈的可读性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读者，而阅读之

后，又感到是对自己灵魂的净化。

她在事业上虽因春风得意而有些踌躇满志，却也并非活得轻松，一种不可名状的失落感，不时地就会搅扰在她的心头。在高级消费场所采访时，经常有一些腰缠万贯的阔佬们和个体暴发户、倒儿爷对她说：“你是记者，社会地位比我们高，但我们敢喝50块钱一杯的洋酒，你却掏不出来，这方面，我们就比你优越。钱是什么？是他妈王八蛋！可没有它，你就活不‘滋润’，显得寒酸。”她一时语塞，不得不承认搞文字工作劳累、清苦。如果她心眼儿“活泛”一点，可以利用职业之便为自己捞取一些额外之财，但她不能这样使然，那会有悖于职业道德和她做为人的良心。心情矛盾时，她总这样想：她的工作有意义，真正是她毕生从事的事业。以此来排遣“失落”的情绪。她认为：她和阔佬们在“钱”的看法上，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尽管从他们的经济差别中，明显地反映出“脑体倒挂”的严重社会现象，却不管这种现象是否合理，是否长期存在下去，“我要在自己深深热爱的新闻道路上走下去。”

于是，她给自己立下了这样一条座右铭：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写文章。

目 录

总序	(1)
“在自己深深热爱的新闻道路上走下去”(序) ..	(1)
私人轿车诙谐曲	(1)
骚动的剧场	(23)
迷离的录象带	(47)
美,不仅仅是追求	(64)
“洋”消费	(73)
并非书的忧患	(81)
名烟的震荡	(88)
鬼市	(96)
走穴轶闻录	(111)
迷蒙的咖啡厅	(121)
疯狂的迪斯科	(128)
重塑民魂	(136)
北京人的国家意识	(144)
亚洲的星辰	(151)
走过废墟	(159)
二环路上的牺牲者	(167)
新一代马兰人	(176)
深圳不怜悯眼泪	(189)
电话计费无人监控	(204)
伟大的和渺小的	(219)

私人轿车诙谐曲

1988年8月18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的显著位置上发表了这样一条消息:

“中国消费野马正脱缰狂奔——仅八、九年间,中国老百姓的消费目标从老三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转向老四件(单门电冰箱、单缸洗衣机、黑白电视机、普通收录机),再转向新五件(彩电、双门电冰箱、双缸洗衣机、高级音响、高级照相机),这风驰电掣般的转换速度,在世界上绝对要拿金牌。”

然而,就在记者写这篇报道的时候,一样比“新五件”更加高档的消费品——小轿车,已经悄悄驶进了数千户北京居民的家庭。

这不像西方一位银行家所说“是种神话”,而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新闻事实:在现阶段的中国,小轿车已经成为“先富起来”的那部分国民的最新追求。高速,舒适,安全,豪华,它不仅是最理想的代步工具,而且是保值的硬通货,多余钱财的宣泄渠道,一定社会地位的标志,家庭的高档装饰物。它可以在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两方面都使人得到充分的满足。那东芝28吋彩电,那尼康F4高档相机,那山水电脑控制音响,甚至就是那900移动电话,都在这4个轮子的“现代加速器”面前黯然失色。

目前拥有小轿车的是些什么人？

有的是文化艺术界及体育界的名流；

有的是民办、合营、私营企业的经营者，个体户和农村中的专业户；

还有的是有海外亲属“赞助”或能继承先辈留下的遗产的人等等。

在我们接触的私人轿车的拥有者中，几乎没有人情愿和我们谈他们的车以及与车有关的任何事情。税务的达摩克利斯剑在神州高悬，我们完全有理由做出这样的判断：绝大多数私人轿车的拥有者，都够得上个人收入调节税的纳税人。那些企业主们还面临工商所得税。自从治理整顿开始以来，人们变得怕露富了。害怕追缴税款，害怕流言，害怕嫉妒，害怕盗窃，害怕招惹是非，他们宁愿关紧门户，不显山不显水地来享受他们先于一般人得到的现代物质文明。

但是，那在北京街头奔驰着的数千辆私人轿车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们把车痕留在大地上，把尾气喷撒到空气中。循着它们的辙迹，就看到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上，所经历的种种矛盾，种种困扰，种种喜悦，种种希望。

第一章 车场掠影

从菲亚特126P到奔驰280

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车辆管理所担负着全市所有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管理工作，但在整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所有的统计表中，都很少有“私人轿车”。

建国30年来，北京的私人轿车屈指可数。虽然并没有任

何禁止私人购买小轿车的法令，但那极个别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如艺术大师梅兰芳、马连良等购买轿车，也是经过特批。平民百姓购买汽车的事，根本没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陆续有人揣着大兜票子走进汽车贸易公司，询问个人可不可以购买汽车。面对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有关部门向上请示，终于得到了“允许购买”的明确指令。到1982年，在一次非正式的统计中，北京有了私人汽车60多辆。

1986年1月，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管所第一次给私人小轿车单独立项，一辆一辆数的结果，已达759辆。可到底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789辆！此后私人轿车的数量逐年剧增：1987年底为2431辆，1988年底为3805辆，到1989年底，是5120辆。

最初购买私人轿车的人纷纷看好波兰的菲亚特126P，在80年代中期，它的售价仅9千余元。但它毕竟太小，并因此得了个“甲壳虫”的绰号。后来的人们便把选择的目标转向了东欧的拉达、波罗乃兹、达吉亚等。近年来投放市场的中日合资车——天津的夏利被认为是新一代家庭型轿车。一商局所属的信托贸易公司为购买轿车的人们开启了另一块新天地：这里出售外国驻华人员处理的“二手车”，价格既低，又不乏好车，不过当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买到这种非常合算的车的。北京另一个出售旧车的地方是左安门的汽车交易市场，这里进行着大量的汽车自由贸易，有些只不过在市场管理处履行一下形式上的手续，一批汽车贩子活跃其间。

随着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私人轿车的档次也在提高，如今购置豪华轿车的已不在少数。一位公安干警讲到的一次奇遇：那天他在工人体育馆一带值勤，发现一辆奔驰280

停放在禁止停车的地方。他以为是首长车，过去一问，却是一辆私人轿车！

私人轿车的兴起使得驾驶学校更加兴隆。为“赶潮”而学车的人和为生计而学车的人不尽相同。他们是受人瞩目的一群，在教练场上更加潇洒，更加自在，更加轻松，也更加趾高气扬。

明星大会车

凡是读过钟秋所著《1988：明星大走穴》长篇报告文学的人，都不会为到1989年那么多明星都拥有了自己的小轿车而感到丝毫的不解。

1989年接近岁末，当影星刘××为第二次离婚案乘着一部雪亮的皇冠车，抱着一只哈叭狗出现在崇文区人民法院门口的时候，从守候在那里的人群的眼中投射出的，有兴奋，有好奇，有羡慕，有鄙夷，唯独没有惊讶。而她的丈夫陈××骑着一辆旧自行车的强烈反差，又在人群中留下一片感叹。

拍摄电影《傻帽经理》时，陈××开着自己的拉达轿车。那一天在北京站，他的亮闪闪的光头一出现，立刻吸引来上万人围观。可陈××的小车另一次在北京站亮相却不那么风光了：为了他诉《湖南广播电视报》等三单位侵害名誉的那场轰动的官司，湖南省长沙市北区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女）带着儿子到北京调查，陈××亲自开车去接站。结果被告一方对长沙市北区法院提出了不信任议案，官司最后改由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有的报道说歌星成××到外地走穴，曾因在票已全部售出、开场在即的当口不辞而别引得舆论大哗。但北京团市委

对成××一直保持着良好印象。他们说，在邀请的演出中，成××不但分文不取，而且总是开着自己的车来去，有时连饭都不吃。

不久前的一天，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管所牌照科的大厅里忽然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一位仪态万方的妙龄女郎款步走向窗口来办私车牌照手续，有人认出她就是唱《小小的我》的苏×。

笑星马×和赵×在台上是一对老搭档，俩人的车也相同，原来都是桑塔纳，后来又都换了夏利。桑塔纳是比较气派，可每百公里要耗12.3公升油，夏利百公里耗油量才7.8公升，花自己的钱还是应该算计算计。高×最早骑轻骑，后来上日本拍《望乡之星》，带回一辆本田400大摩托车。再后来他卖了这辆摩托买了一辆小丰田轿车，小丰田又换成大丰田。唐××和别人“合资”买下了高×的小丰田，后来他“退”了“股”，“独资”买了一辆夏利。冯×买的也是夏利。钱××多年来一直开他的丰田，这辆车和它的主人一道历经沧桑，而在主人的精心保养下，至今仍鲜亮洁净如一位“新嫁娘”。姜×先头买的是一辆二手尼桑，现在也鸟枪换炮了，换成了最新出品豪华的标致。然而姜还是老的辣，侯××坐的是奔驰。

一位著名作家和我谈到他的车：“我的车可是按市场价买的，×××（一位著名影星）的车市场价8万，他说花了两万。其实付没付钱谁知道呢，说不定演两场就顶车款了。”无法考证，也没必要考证。文艺界（也可能还有其他界）一些人的车确实来得便宜。某著名女播音员的车只花了3000元，虽说是二手车，这价格也差不多等于白送。某著名作曲家的车是由某音像出版公司以稿费名义给买的，条件是该公司出的

音乐磁带全部由该作曲家配器。

这事只须“两厢情愿”。

公安机关部门很多，而和文艺界关系最好的，大概要算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了。全国交通厅局长会议在北京举行，姜×、唐××、成××、董××、方×等大明星不惜“屈尊”和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业余宣传队同台举行慰问演出。北京西城区交通安全委员会和西城交通大队打算合办一台“笑的晚会”，交通安全委员会的老丘去找马×，直截了当说：“咱没钱，顶多管顿饭。”马×乐呵呵说：“这事你们别管了，人由我负责找。”一台区一级的演出，马×、赵×、笑×、李××等曲艺界的“大腕”全参加了，“笑的晚会”笑声震天。

幸运的车牌号

在我们遇见那位著名民主人士的孙子L以前，“3366”这个数字在我们的认识中，只是那无限长的数字序列中一个普通的自然数而已。

但是L单单挑选这个数字，作为自己新购置的美国别克小轿车的车牌号。车是从市贸易信托公司买的二手车，某外国驻华使馆的二秘的，售价50600人民币。

“为什么要这个车牌号呢？”我们问。

“就是为了顺。”他极简单地回答。

数字，作为一种抽象的符号，本来没有任何社会内容。但是人们出于一种对于超自然的“神力”的信奉，根据它们的发音，给它们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8——由于粤语谐“发”音，从而成为最吉祥的数字。在商品经济社会，它就是幻化成数符的赵公元帅。

6——在南方多种方言中都发“陆”音，既可被解释为“门路”、“途径”的“路”，又可被解释为官俸的“禄”。在北方广大地区则有“六六顺”的说法，因此它也是大吉大利的数码。

4——被认为是最不吉利的数字，因为它谐“死”音，镶在车上尤其忌讳。

7——（气）也让人腻味，谁愿意老让不痛快缠着自己呢？

数字的组合奥妙无穷。能够据有8888这个车牌号的，一定是位“幸运之星”。8686（发够发够）、1388（一生发发。6和3在广东话中发“goù”音和“shèng”音），都是令人倾心的牌号。“5658”（无路无发），5毁了6和8。不过5又在“5457”中化凶为吉，可“无死无气”，又怎么比得上“3838”——“升发升发”！

“汽车阶层”都愿意自己鸿运长久。也有人挑选车牌号，只是由于某个数字于自己有特殊的意义。极少数人是为了便于记忆。然而有挑选的权力（或路子）的人毕竟远远少于有挑选的欲望的人，绝大多数轿车还是得“随遇而安”。

由于是×××的孙子，L得以如愿以偿。他驾着他的别克喜气洋洋驶出车管所，簇新的车牌，“3366”4个白字在绿色底版上闪着骄傲的光。确实是一个幸运的车牌号呢——“升升禄禄”——升官有路，官高则禄厚，两个3相加又是一个6，六六顺，六六六，顺上加顺！

这是一则外国幽默：

父子二人在观光大饭店门口看到一辆豪华的进口轿车，儿子对父亲说：“坐这种车的人，肚子里一定没学问。”父亲答道：“说这